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靖國問題和歷史認識

doi:10.6752/JCS.200703_(4).0003

文化研究, (4), 2007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4), 2007

作者/Author：高橋哲哉(Tetsuya Takahashi);孫軍悅

頁數/Page：174-18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7/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703_\(4\).0003](http://dx.doi.org/10.6752/JCS.200703_(4).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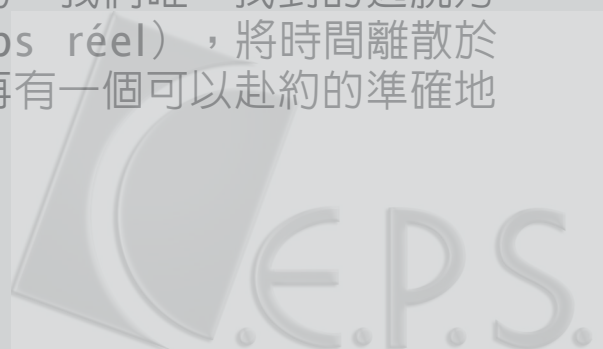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我總是準時赴約。準時的程度就像赴死神之約，當然那時我們確實只能準時。或者，死神無論如何總會赴約。並不是它在那兒等待我們，而是，當它出現的時候，我們也會到達。這樣很好。讓人擔心的（致死的？）是，預期這個無可避免的巧合，準時到達無關緊要之處。無論如何，從不準時到達者只是和死神玩延遲的遊戲。然而，我們的文化自從數世紀以來，便訓練我們強迫性地準時，也就是和死神準時赴約。我們唯一找到的逃脫方式，便是即時通訊（le temps réel），將時間離散於恆續的介面中，使得死神不再有一個可以赴約的準確地點。





我曾經玩過激情，我曾經玩過溫柔。

我曾經玩過分離，我曾經玩過悲傷。

我甚至曾經盡我所能地表現悲傷，就如同盡我所能地露出誘惑的表象。有時我甚至覺得除了提出觀念的表象之外我啥也不曾做過。然而在一個沒有出路的鏡象世界裡你唯一能做的：為觀念提出最成功的符號。

或者，在一個沒有出路的情緒世界裡，為激情提出最成功的符號。

思想翻譯

一年前我們於第二期發佈了一則「戰後正義，寬恕，歷史否認」的專題徵稿，試圖引起對於東亞各國戰爭、內戰或國家對內部人民鎮壓等情境之後的正義與倫理問題的探討。雖然專題徵稿的立即回應不多，我們卻注意到這是個在國際上持續受到關切的主題，而且不止於東亞區域。2006年12月，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與日本東京大學在巴黎聖德尼歷史博物館舉辦了一場「歷史否認與記憶工作」學術研討會，多樣的主題極具啟發，例如：日本與德國戰後對待歷史態度的比較；奧地利二戰期間兼具主權受侵略以及排猶共犯的雙重角色在其當前國家神話的微妙整飾策略；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法國警察謀殺反戰運動分子的國家罪行；「Kravchenko事件」或1950年代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對古拉格集中營真相的否認；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阿籍婦女夾迫於法國與阿拉伯父權文化的雙重困境；西德—東德的記憶投射；赤柬政權屠殺的記憶與否認；華人對南京屠殺歷史記憶的投資對照於1949年中國「解放」後鎮壓反革命以迄文革、六四的官方歷史封鎖；南韓光州事件的國家紀念；靖國神社的問題……。這些論文探討的案例，不僅僅如同用來標示他們的國別或事件那般「局部」，而是多重的問題意識，與我們置身其中的認同與政治經常有著切身的相干性。

以本期翻譯的兩篇文章〈靖國問題和歷史認識〉、〈BC級戰犯和「法」的暴力〉為例，高橋哲哉精鍊地呈現問題的複雜性，使得「靖國問題」不再需要加上「日本」這樣的冠詞，因為「靖國問題」不再是任何意義下給定的歷史內容，而成了一個一再被建構與必須不斷解構的問題意識，一個歷史的奇點：既超乎了日本的主權政治，也不局限於日中或日韓外交層次的利害與策略，不僅牽涉當前日本右翼國族主義對未來的投射，也不斷召喚出過去日本殖民東亞的歷史幽靈，一個迄今仍有朝鮮人與台灣人被迫合祀的問題牌位。「靖國」甚至不單純是東亞區域的問題，靖國裡的「戰犯」，見證了1945-46年

在紐倫堡與東京國際戰犯法庭上廢黜戰敗國主權的世界新秩序，然而被審判處死的「戰犯」卻又是承擔冤罪與功勳的「殉國英靈」，反嘲那短暫的勝利者正義，戲謔著仍然必須與國族主權妥協勾搭的世界新秩序。

我們以高橋哲哉的兩篇文章，作為「戰後正義，寬恕，歷史否認」「專題不專輯」嘗試的首輪。也就是，本刊持續關注與召喚這個專題上的研究，不以單期專輯一次刊出而是以3至4期連續呼應的方式進行專題呈現。在這個專題上率先出現日本學者對於「靖國問題」的批判，應不感到意外。自50年代以來，日本史學界與公民社會對於包括右翼國族主義在內各種形式的歷史否認，早已有著漫長的鬥爭與幹練的經驗。在案例、史料與觀點上，即便是華人世界與中國晚近對於日本戰爭罪責的關注與國家紀念的投資，都仍有許多有待向日本既有研究學習的地方。

在歐洲領先兩個世紀的國族主義目前已趨向不同展望的時代，東亞區域似乎仍是後進國族主義寢寢然勢起的區域。日本、韓國、中國與台灣的國族主義，相互之間不乏秘密共謀增進權力的情挑。它們必須同時受到警戒，不僅因為那是可能在未來釀成覆巢災難的勢力，也因為它們早已是當今每日劑量的勒索與脅迫。隨手拈來近日報紙：提及日皇昭和戰爭責任的長崎市長遭到狙擊身亡，不過是同類系列謀殺的又一樁；《藝伎回憶錄》裡章子怡「躺在日本男人身下」的劇照在中國網上引爆「賣身賣國」的激憤，大概足以類比「愛台灣」激情下每日的「賣台」檢查。「戰後正義，寬恕，歷史否認」這個主題不可能在國族優先的思考下進行。唯有不受國族界域限制的心靈能夠在感性與智性上攜手，方足以堅定制衡東亞區域內國族主義的氾濫與勒索。

這兩篇文章，也是本刊新設「思想翻譯」稿類的首度嘗試，請參閱本期所附「思想翻譯」稿類說明。

靖國問題和歷史認識*

高橋哲哉

Tetsuya TAKAHASHI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孫軍悅 翻譯

一

2006年7月20日，《日本經濟新聞》幾乎使用了整個頭版報導了一條特快消息，透露說在前宮內廳長官富田朝彥紀錄昭和天皇非正式發言的筆記（以下稱爲「富田筆記」）中，發現了1988年天皇有關靖國神社的陳述。根據筆記內容，昭和天皇對於A級戰犯被祭祀於靖國神社一事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並因此而中止了靖國神社的參拜。

昭和天皇不僅在1945年戰敗以前，在戰敗之後仍然前往靖國神社參拜，直到1975年結束了戰後的第八次參拜以後，就再也沒有去過。如果「富田筆記」是可信的話，其原因應在於1978年靖國神社將14名A級戰犯作爲神合祀在神社了。

戰敗以後，25名日本的戰爭指導者受到東京法庭的審判（極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破壞和平」的罪名（侵略戰爭的策劃、遂行等）被判爲有罪。其中，以東條英機首相爲首的7名被判處絞刑，另有7名死於獄中。在聯合國占領結束之後，厚生省將這14名戰犯和一般戰死者一樣認定爲「公務死」，靖國神社則將他們作爲「殉國者」＝「昭和殉難者」祭祀於神社中。

《文化研究》第四期（2007年春季）：178-187

* 本文發表於「歷史否認與記憶工作」(Dénis Historiques et Travail de la Mémoire)國際研討會，2006年12月1-2日，巴黎八大極端暴力研究組、東京大學哲學研究中心主辦。巴黎：聖德尼歷史博物館。

靖國神社原名為東京招魂社，創建於1869年（明治維新後的第二年），是按照明治天皇的「聖旨」，為表彰那些在幕末維新的內戰中戰死的倒幕派（即「官軍」）對建立新的天皇國家（明治政府）所作出的貢獻而建造的。1879年改名為靖國神社。此後，作為唯一一所軍管神社，從近代日本的首次海外派兵——即台灣出兵（1874年，編按：台灣史稱「牡丹社事件」）——開始，經過甲午戰爭（1894年）、日俄戰爭（190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九一八事變（1931年）、日中戰爭（1937年），直到太平洋戰爭（1941年）的戰敗為止，在舊日本軍所發動的所有的對外戰爭中戰死的軍人和軍屬，共246萬「英靈」被祭祀於靖國神社。

在「大日本帝國」時代，天皇既是國家的主權者，作為「現人神」又具有宗教色彩，而且還是軍隊的最高司令官「大元帥」。日本國民包括殖民地人民在內都是天皇的臣下＝「臣民」，「在國家危難之際不惜犧牲性命而效忠於天皇和國家」是「國民的道德」。戰死的軍人因其在天皇的戰爭＝「聖戰」中實踐了「國民道德」而成為國民最高的模範，作為「護國神」被祭祀於靖國神社，接受總理大臣、陸海軍大臣以及天皇的參拜。這一整套制度不僅可以提高日軍的士氣，而且使戰爭時期全體國民的精神總動員成為可能。

戰敗以後，靖國神社被看作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戰爭神社」、「侵略神社」，其勢力被日益削弱。1945年12月，根據聯合國占領軍總司令部(GHQ)發出的「神道指令」，靖國神社和其他神社一起從國家組織中被分離出來，和基督教教會、佛教寺院一樣成為了民間的宗教法人，直至今日。

由於小泉純一郎首相於8月15日（日本戰敗日。對中國來說是抗戰勝利紀念日，對韓國來說是擺脫殖民地統治的解放紀念日）（編按：為2006年8月15日）進行第六次靖國神社參拜的可能性愈來愈高，富田筆記被公諸於世的7月20日恰好也是日本、中國、韓國等對靖國問題最為關注的時期。小泉首相在2001年就任首相之後堅持每年參拜一次靖國神社，至今已參拜了五次。在此過程中，靖國問題成為了日中、日韓最大的外交懸案。

中國政府在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公式參拜」靖國神社時開始正式提出抗議，批判日本首相參拜供奉著A級戰犯的神社令人懷疑日本政府對戰爭責任的認識，嚴重傷害了遭受過日本侵略的亞洲人民的感情。在這一點上韓國政府也持同樣態度。中曾根首相在接到中國政府抗議之後，第二年中止了參拜。然而小泉首相卻把中國和韓國的批判斥為「內政干涉」，反而為自己製造出「不屈服於外國的壓力，堂堂正正地貫徹日本立場的領袖」形象，來維持自己的支持率，致使中韓首腦屢次拒絕和小泉首相會談，日中、日韓間的政治關係跌落谷底。

如果僅僅作為日中、日韓的外交問題來看，靖國問題的核心在於靖國神社內祭有A級戰犯。政治和媒體基本上也是在這一層面理解這個問題的。自中曾根首相以來，重視中國和韓國的抗議，想迴避這一問題的政治家、首相們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將A級戰犯從靖國神社分祀出去，以日本和近鄰諸國的友好關係為重的媒體也抱有同樣的態度。《日本經濟新聞》所報導的富田筆記便是在這一背景下登場的。支持靖國神社和首相參拜的人企圖降低筆記作為證據的可信度，但沒有成功。而《日本經濟新聞》、《朝日新聞》等反對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一方則利用富田筆記來加強自己的說服力：「就連昭和天皇也因為靖國神社供奉著戰爭責任者的A級戰犯而不再參拜，小泉首相當然應該停止參拜」。韓國的主要媒體也因為急於想要阻止首相參拜而對富田筆記給予了肯定的評價。

然而小泉首相還是在8月15日參拜了靖國神社。不出所料，中國和韓國政府表示了強烈的抗議。此後，安倍政權代替小泉政權，外交關係進入了小康狀態。但圍繞著富田筆記的種種議論，卻顯示了有關靖國神社的歷史認識的問題所在。以下，我想就靖國問題所包含的「歷史的偽造和否認」作一下分析。

二

第一，靖國神社將A級戰犯供奉為神，日本首相前往參拜顯然是對日本戰爭責任的否認。

的確，在參拜靖國神社的戰後歷代首相中，還未曾有人公開否認日本的戰爭責任。就連小泉首相也承認，1995年村山首相發表的談話——日本在「不遠的過去一段時期，由於國策的失誤、殖民地占領和侵略行爲，給近鄰諸國的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對此表示衷心的謝罪和沈痛的反省」——仍舊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場，並明確表示自己沒有否認戰爭責任的意圖。

然而，靖國神社公然主張「先前的大戰」是「自存自衛的戰爭」，是爲了將亞洲從歐美的殖民支配中解放出來的戰爭，所以不論是A級還是B級、C級，所謂「戰犯」是冤罪，是戰勝國通過單方面的審判所強加的不正當的名稱。事實上，靖國神社不僅是一座追悼設施，同時還是將戰死軍人奉爲「英靈」，表彰功績，將其推崇爲「神」的彰顯設施。而爲了表彰戰死者的功績，就不能承認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日本首相前往參拜供奉著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當然會使人們對日本政府有關戰爭責任的認識產生懷疑。

可是，如果我們把靖國神社在歷史認識方面的問題僅僅看作是A級戰犯合祀的問題，那麼問題就被簡單化了，從而也無法阻止「歷史的偽造和否認」的延續。如果問題僅在於A級戰犯的合祀上，那麼只要把A級戰犯的牌位移出靖國神社，就什麼問題也沒有了。的確，中國政府出於對日中關係的政治性考慮，將問題限定於A級戰犯來作爲解決外交問題的策略，我們可以理解這一立場。然而，如果日本的政治和媒體也只從這一層面來理解靖國問題，也就是說，認爲只要把A級戰犯從靖國神社分祀出去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那麼我們就必須指出這裡面所包含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對「歷史的偽造和否認」。

第二層歷史的否認起因於對A級戰犯這一概念的依賴。所謂A級戰犯，是東京法庭在審判自九一八事變至中國侵略戰爭以及太平洋戰

爭之間的戰爭指導責任時所使用的概念。即從九一八事變的準備時期1928年1月開始到1945年8月為止的戰爭責任。換言之，東京法庭和「A級戰犯」這一概念並沒有追究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侵略亞洲的歷史。1928年，日本已經是一個擁有朝鮮、台灣等眾多殖民地的殖民帝國了。但是在東京法庭上審判日本的聯合國當中，美國、英國、荷蘭、法國都是殖民統治國家，根本沒有打算也沒有資格審判日本的殖民統治的責任。可是，供奉在靖國神社中的是自1874年的台灣出兵以來，日本在侵略亞洲周邊地域，樹立殖民統治的過程中戰死的所有的日本軍人。

台灣的殖民統治是通過軍事鎮壓台灣人民的武裝起義和台灣原住民族的抵抗運動而樹立起來的。而朝鮮殖民統治則是通過江華島事件（1876年）之後的日本軍的軍事攻擊和鎮壓朝鮮人民的義兵鬥爭而確立的。在這些過程中死去的日本軍人和在鎮壓殖民地獨立運動的軍事行動中戰死的日軍都被看作是對「帝國」=「天皇的統治」擴大作出貢獻的「英靈」而成爲了靖國神社的神。靖國神社和近代日本的殖民主義完全是互爲一體的。它通過把這些戰死者和作爲A級戰犯被處死的軍人放在一起，永遠作爲彰顯的對象，來不斷否認殖民統治的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這第二種否認，即是對發動中國侵略戰爭之前的亞洲侵略、殖民主義的否認，這不僅存在於所謂的右派歷史修正主義者當中，而且在承認A級戰犯戰爭責任的《朝日新聞》以及「進步知識分子」當中也是根深蒂固。「躋身於歐美列強的『明治』是偉大的，到了『昭和』日本才變壞了」；「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時期的日本軍是健全的，而到了中國侵略之後就墮落了」等等，諸如此類的歷史觀是受到了通過NHK、《朝日新聞》而成爲了「國民作家」的司馬遼太郎的影響，在思想比較開放的日本人當中也普遍存在。而這一歷史觀背後所隱藏的對殖民主義的否認，在靖國問題方面，便表現在了將問題簡單地看作爲A級戰犯的問題。

把問題集中在A級戰犯身上，同時也是對九一八事變之後的戰爭責任的推託。這是靖國問題的第三層「歷史的否認」。其構造清晰地表現在上述有關富田筆記的報導及種種議論之中。愈是強調「昭和天

皇因為對A級戰犯被祭祀於靖國神社不滿而停止參拜」，並對此給予肯定的評價，就愈容易造成「所有的責任都在A級戰犯身上，天皇沒有任何責任」的印象。這和東京法庭因美國的政治意圖而免去昭和天皇戰爭責任的構造如出一轍。在東京法庭所審判的所有的戰爭期間，作為日本的最高責任者（統治權者）、日本軍的最高司令官（大元帥）的昭和天皇被免於起訴，戰後仍舊能夠作為「日本國以及日本國民的統合的象徵」（憲法第1條）而存在，完全是因為美國為了防止東西冷戰期間日本的共產化而利用天皇來實行占領統治的策略。由此可見，始終被隱蔽、否認的天皇的戰爭責任通過強調A級戰犯問題而再一次被否認了。

不僅是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天皇的戰爭責任，而且除了A級戰犯以外，指導層、公共媒體、知識分子、文化人、宗教家、教育家等各層國民的戰爭責任也都被否認了。如果問題只在於A級戰犯的話，那麼其他軍人的責任、靖國神社本身的責任都將不再被追究。

三

以上是有關靖國神社的議論中所存在的三個階段的對「歷史的否認」。第一階段的否認是靖國神社及右派修正主義者對日本侵略中國之後的戰爭責任的否認。第二階段的否認在上述承認戰爭責任的人們當中也普遍存在。即通過將侵略戰爭的責任都歸於A級戰犯來否認其他主體、尤其是天皇的戰爭責任。第三階段的否認在自由派以及「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當中也隨處可見。即把日本的侵略責任集中到中國侵略戰爭以後，從而否認在此之前的殖民主義的責任。這三種否認都是對於被祭祀在靖國神社的「英靈」所參加的舊日本軍戰爭評價的否認，也就是說對戰爭侵略性的否認。

如果我們把目光從靖國神社所支持的戰爭的歷史評價轉到被祭祀在靖國神社裡的死者的戰死問題上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靖國神社不僅帶有否認戰爭侵略性和戰爭責任的性格，同時還是一個通過將戰

死者的陣亡「偽造」成「名譽的戰死」來否認歷史事實的裝置。

靖國神社「偽造」了士兵們「戰死」的事實，將戰場上慘不忍睹的血腥的死偽造成了神聖的、崇高英勇的「名譽的戰死」。在此意義上的歷史的偽造至少有三種形式。

第一種最明顯的「偽造」是對出身於朝鮮、台灣等殖民地的戰歿士兵的「偽造」。目前靖國神社內祭祀著被動員參加了日本的戰爭而戰死的殖民地出身者共5萬人左右，其中朝鮮人和台灣人各2萬餘人。日本在殖民地也實行「皇民化教育」，要求朝鮮人、台灣人也「為天皇的國家效命盡忠」。但徵兵令施行以後，不僅是那些被強制動員的人，甚至是「志願」參戰的軍人、軍屬也是出於為擺脫異民族歧視的目的，並沒有真正地從心底信奉靖國信仰。

殖民地解放後，1978年台灣遺族第一次向靖國神社要求取消合祀。之後，韓國遺族也提出取消合祀要求，並訴諸於法律。遺族主張道：「和侵略、殖民統治的加害者一起被祭祀於加害民族軍國主義象徵的靖國神社，是無法容忍的屈辱」。然而靖國神社對所有的要求一概拒絕。其理由是：「戰死的時候是日本人，死後怎麼可能變成不是日本人呢？作為日本兵，當然是懷著死後被供奉在靖國神社的心情而戰死的，所以不能因為遺族要求就終止供奉。既然他們自告奮勇地要求和內地人一樣作為日本人參戰，被祭祀在靖國神社是理所當然的」（1978年，靖國神社權宮司的話）。這完全是無視殖民統治和徵兵令的強制力而捏造出來的「自發的名譽的戰死」。

第二種是在沖繩戰中死去的普通市民。沖繩原本是位於日本和中國之間的獨立的琉球王國。1879年，明治政府以軍事力為要脅消滅了琉球王國，設置了「沖繩縣」。琉球王國和原住民愛努族（アイヌ，Ainu）所居住的北海道是近代日本殖民主義的最初的對象，和朝鮮、台灣不同，被稱為「內國殖民地」，在日本的統治下實行了強力的同化政策。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軍在和登陸沖繩的美軍作戰中，展開了所謂「軍民一體」的悲慘的「沖繩戰」，致使大量非戰鬥人員被捲入戰爭，造成了10萬名市民的死亡。其中有的因被日軍視為間諜而

遭殺害，有的因不准投降而被迫「集團自決」，很多人都是因為信任「友軍」日本軍隊而犧牲的。

這些戰死的沖繩居民，很多都被供奉在靖國神社了。爲什麼一般市民會被祭祀在供奉軍人、軍屬的靖國神社呢？1958年，根據《遺族援護法》的規定，遺族年金的支付對象擴大到了「響應軍隊要求的參戰者」，於是行政方面以「可以領取遺族年金」爲由勸說沖繩市民的遺族也提出申請。靖國神社將「響應軍隊要求而參戰的人員」以「準軍屬」的名義合祀，結果，實質上是日軍戰爭受害者的沖繩居民卻被當作軍隊的「合作者」而供奉在靖國神社，就連被迫「集團自決」的孩子和剛出生的嬰兒也被視爲「爲國光榮戰死」的靖國「英靈」。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軍部爲隱瞞沖繩戰悲慘的現實，尤其是造成大量市民犧牲的責任而炮製出的又一個「歷史的偽造」。

最後，將日本軍的軍人、軍屬的戰死視爲「名譽的戰死」而加以彰顯，將其聖化爲崇高英勇的死，是對「戰死」這一事實本身的否認，也是對作爲事實的歷史的否認。在此意義上，應該說作爲「英靈彰顯」設施的靖國神社、靖國思想本身就包含了對歷史的否認。

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內的約246萬名戰死者當中，200萬名以上是太平洋戰爭的戰死者，其中60%不是死於戰鬥，而是廣義上的「餓死」。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明知糧食供應困難而將大量兵員投入到新幾內亞等南太平洋地區，致使大多數的士兵不是死於和聯合國軍隊的戰鬥中，而是在熱帶雨林中彷徨掙扎，彈盡糧絕，死後屍體腐爛，化爲白骨。這種慘絕人寰的景象卻因爲被祭祀於靖國神社之中而被掩蓋了。士兵們被看作是爲保衛國家的崇高使命和敵人英勇作戰而光榮犧牲的「英靈」。當然，不僅是餓死，在戰場上陣亡本身就是悲慘的。可是靖國神社卻將戰死的恐怖、血腥、腐爛的一面清除得一乾二淨，將其昇華爲神聖的空間、崇高的「神域」。

更重要的是對遺族感情的影響。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戰死者遺族的悲傷、哀悼的感情很可能轉化爲對戰爭及發動戰爭的爲政者的質疑、批判和憤怒。靖國神社祭祀戰死者的臨時大祭和天皇的參拜

便是將遺族的悲哀180度轉換為喜悅的「感情的煉金術」所發揮效果的場面。高知縣有一位名叫筒井松的婦女，她的4個兒子都是軍人，3個兒子戰死後被祭祀在靖國神社。她在1944年1月發行的雜誌《主婦之友》中談到，當接到長子和次子戰死的消息時心中充滿了悲憤和哀傷，然而當她作為遺族被邀請參加靖國神社祭祀兒子們的臨時大祭，看到天皇參拜的時候，便「像受到電擊似地恍然大悟了」。「天皇陛下前來參拜是因為兒子們是為了國家而犧牲的，再也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了。好兒子，真了不起！」於是，悲傷和痛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滿腔的喜悅和自豪。為了讓遺族接受親人的戰死，讓廣大國民肯定戰爭，靖國神社和天皇參拜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論具體情況如何，日本軍人和軍屬的所有戰死都通過這一過程被聖化成了「為國捐軀的獻身行為」。

四

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富田筆記。今(2006)年夏天有人利用這篇報導批判了小泉首相的參拜，但從中長期來看，這種方式反而會帶來相反的效果。對於靖國神社和企圖利用靖國神社的為政者來說，最重要的是恢復天皇參拜。事實上，「無論如何都要改變目前這種連昭和天皇都無法自由參拜的異常狀態，不但要讓首相、還要讓天皇的參拜固定下來」的呼聲愈來愈高。

不容忽視的是，今年夏天，以麻生太郎外務大臣為首的幾位有力政治家為了恢復天皇參拜，提出了靖國神社國營化論，試圖將戰敗以後從國家機構中分離出來成為了宗教法人的靖國神社再次國營化。這一構想早在自民黨從1969-1974年間每年向國會提交的《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中就有了。當時由於擔心軍國主義復活的反對意見非常強烈而沒能實現。然而30年後的今天，自民黨的實力政治家開始主張道：「除非靖國神社國營化，否則無法由國家決定分祀A級戰犯，得到中韓理解，使首相、特別是天皇參拜成為慣例」。

去(2005)年秋天，自民黨發表了《新憲法草案》，改訂憲法9條，明確記載「自衛軍」的保持，以「自衛」和「維持國際和平」等為由，為取消禁止行使武力的規定邁出了第一步。安倍首相明確表示將在任期內著手改正憲法，加強為「集團自衛權」的行使和《海外派兵恆久法案》的制定等日本軍事力的行使，來創造條件。事實上，在陸上自衛隊被派往伊拉克時，自衛隊內部已經討論過如果出現死亡人員是否能夠被合祀於靖國神社的問題。如果靖國神社實現了國營化，今後自衛隊甚至「自衛軍」在海外戰鬥中出現死亡人員時，毫無疑問戰死者將被合祀於靖國神社，接受首相及天皇的參拜，被表彰為「為國獻身的名譽的戰死」。

十九世紀，經過明治維新而成立的日本政府創設日本軍隊，建造作為日軍支柱的國營靖國神社，發動了多次戰爭。這一制度在1945年戰敗時終於被摧毀。然而時隔60年，二十一世紀的日本政府卻試圖重新設置「日本軍隊」，並建立國營的靖國神社來作為日軍的支柱。包含了多重「歷史否認」的靖國神社作為發動新的戰爭的裝置而再次復活的一天是否會到來呢？